

骤热上海

□ 崔立(上海,公务员)

上海的天,像一对刚刚相识的年轻男女,说热就热了。

午休后,我去市区开会,从办公楼到地铁站,有好长一段路。热气腾腾。到地铁口时,我已经浑身粘乎乎的了。地铁坐到市区,从地铁站走出来,到开会的办公大楼。大太阳热辣辣地,似乎比刚才更热了。这天啊,热得让我几乎都要疯了。

在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,我吹着徐徐凉风,点开手机,在朋友圈发了一番感慨:这蒸笼的天啊,还让不让人活了……

会议的间隙,我站在窗口,点开微信,那条短文字下,几十个赞,还有许多评论,多半都是抱怨这天的,看来我们是有共鸣的!

窗外,我看到几个环卫工人在清扫马路。他们都戴着帽子,还有深蓝色的外套,把整个人都罩在了里面,从一块地方扫到另一块地方。他们扫得很慢,又很细致,扫得稳稳当当的。还有一个推着垃圾车的,从远处缓缓过来,脸黑黝黝地透着亮。似乎,他们还相视笑了。我愣愣地看着,再看看他们头上大大的耀眼的大太阳,难道他们不热吗?

回到家,我马上紧闭所有的门,开起了空调。空调“轰隆轰隆”地启动。我去洗了个澡,洗完澡出来,房间里已经完全凉快下来了,像春天。我舒坦地躺在沙发上,也懒得起来烧饭了,琢磨着,晚饭,叫个外卖吧?

吃完晚饭,晚上8点多,还在老家农村的母亲打电话过来时,我还百无聊赖地看着

电视。电视已经看了好一会,调了好几个节目,看不到特别能吸引到我的。

母亲说话时兴致勃勃,带着自豪地说:“今天我去地里干活了,帮承包的老板收割油菜籽。我们好几个人,从早上6点一直割到现在,我割得是最多的……”我很惊讶地说:“那你们中午不休息吗?”母亲说:“不休息啊,为什么要休息?”我说:“天这么热。”母亲说:“热吗?还好啊。”母亲和我说了几句,又说:“不说了,我要抓紧吃饭,还好让你爸提前回来烧饭,明天早上还要去……”

挂了电话,我本来还想吃冷饮的念头突然没了,空调打着冷气,我告诉自己,明早千万不要再睡过头了。



送“催命符”的“医药代表”

□ 陈慈林(浙江杭州,国企干部)

大表兄生了肺癌,需要手术,住进上海一家著名医院。我赶去探望兼陪床。他虽尚未完全确定自己的病情,却已从家人和亲属们躲闪的目光中获得了不良预感,因此情绪很低落。

手术前一天,医生问我们是否要把真实病情告诉患者?权衡利弊,家人怕影响手术效果,决定暂时不把真实病情告诉病人。留恋美好人生是人的本能,有的人健康时慷慨激昂,但当得知自己患癌症后,常会精神崩溃,几个月甚至几星期就走上不归路。善意的“谎言”则可能有利病人健康。大家对他说明说:“你肺上生了一个小东西,医生说切除就没事了,只是个常规手术。”

病房中的四位病人,除大表兄外,两位是肺癌,一位是食道癌,而且都是在两天内先后动的手术。与陪床的亲属私下一聊,都

说没有告诉病人真相,因此我们从不在病房里询问别人的病情,也从来不说一个“癌”字,甚至连细胞、淋巴、切片、化疗等字眼都回避。医生查病房时当着病人说的是一套,到了外面对家属说的又是另一套。陪护的亲属之间要交流什么信息,也是跑到走廊上,避开病人互相咬耳朵、做手势,好像特务在接头,搞得神秘兮兮的。病人虽然也有点预感,但他们也不愿意对家属说破,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天。

一天早上,医生还没有开始查房,突然走进一个穿着类似护士服装的女青年,旁若无人在每张病床上放下两张报纸,就一声不吭地走了。我们还以为是医院给病人送的报纸,也没太在意。对面病床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戴上老花眼镜,随意浏览着标题。突然只听一声:哎呀!老大爷晕了过去。我

抓过报纸一看,吓了一跳,这两张名为“抗癌文摘”和“肿瘤看台”的印刷品,赫然在目印着“肿瘤患者,你吃的是最好的抗癌药吗?”“当医生判了我爱人‘死刑’后”等触目惊心的标题,这对刚动手术没几天,极力回避癌症等字眼,心理已经非常脆弱的病人来说,无异是两道“催命符”!

此时病房里乱成一团,四个病人两个心动过速、一人血压升高、一人休克,护士们量血压、输氧、注射肾上腺素……

我愤怒地抓起报纸,拍在医生的办公桌上,低声吼道:“看你们干的好事!”医生看到报纸,对我说:“又是那些该死的‘医药代表’,他们只顾自己做广告,根本不顾病人的情绪。”当他叫来医院保安,与我一起追出去时,偌大的医院里,那送“催命符”的“医药代表”却早已完成任务“凯旋”了。

